



金代文学 编年史 • 下

牛贵琥◎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牛贵琥◎著

金代文学
编年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第三编

金代后期文学

金宣宗(完颜珣)1213—1223

1213(癸酉)金宣宗贞祐元年(南宋嘉定六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

九月,完颜珣即皇帝位,这就是金宣宗。金王朝转入衰亡期,文学也呈现出不同于往昔的气象。

金宣宗即位后,拜纥石烈执中为太师、尚书令、都元帅,改元贞祐。这时,蒙古成吉思汗分兵三道:“命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洛、磁、相、卫、辉、怀、孟,掠泽、潞、辽、沁、平阳、太原、吉、隰,拔汾、石、岚、忻、代、武等州而还;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鶻、薄刹为左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郡而还;帝与皇子拖雷为中军,取雄、霸、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恩、濮、开、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郡。复命木华黎攻密州,屠之”(《元史》卷一),然后北返。蒙古三军几乎踏遍黄河以北华北平原的领土,只有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等十一城未下。蒙古军对这么广大的地区仍不驻兵占领,而是将各州城的金帛、子女、牛羊马畜席卷而去,就和当初女真对待北宋的广大地区一样。《金史》列传第六十八所载李英妻张氏一事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英初为监察御史,在中都,张居潍州。贞祐元年冬,大元兵取潍州,入其家。张氏尽以所有财物与之。既而,令张氏上马,张曰:‘我尽以物与汝,犹不见赎耶?’答曰:‘汝品官妻,当复为夫人。’张曰:‘我死则为李氏鬼。’顿坐不起,遂见杀。”这就是广大人民的遭遇。

纥石烈执中从镇州调回术虎高琪守中都城以南。高琪至良乡,不得前,又

还中都。十月，术虎高琪与蒙古军交战，败回，纥石烈执中说：“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高琪出战，又败，于是率领部下围攻纥石烈执中宅第，杀纥石烈执中。金宣宗任命高琪为左副元帅，又进为平章政事，决定向蒙古求和。

高庭玉被诬入狱死，一时牵连者有雷渊、辛愿等人。

《归潜志》卷四：“高左司庭玉，字献臣。辽东人。少擢第，入官有能声。吏事明敏，人莫能及。尤倜傥重气节，敢为。为左司郎中，誉甚重，一时人士推仰焉。贞祐初，出为河南府治中。主帅温迪罕福兴，奸伪人也。公临事不少逊让，遂交恶。是时北兵围燕都，事已迫，四方无勤王师。公独慨然有赴援意，屡以言激福兴。福兴惮之，因诬以有异志，辄收赴狱。名士如庞才卿、雷希颜、辛敬之，皆连系。拷掠无实，然公竟为福兴所困，死狱中。余会赦，得释。公既卒，朝命下，除公河南路安抚副使，代福兴。士夫痛愤。后朝廷知其冤，谪福兴远郡，昭雪之。屏山于人材少许可，至论公，独以为真济世材；又言其学术端正，可以为吾儒砥柱。时之不幸，为奸人所害。屏山以诗哭之甚哀。雷希颜又为文以祭，述其事，为时所称。屏山又将文其碑，未著，死。后其子属之雷公，雷公以其仇人犹在，亦未著，死。迄今，事状不详，惜哉。公诗亦高，余家有数十篇，遭乱失去。尝记其中秋诗有云：‘跳上玉龙背，抱得银蟾光。’亦奇语也。”

《归潜志》卷二又云：“忽高公献臣将赴河南，来过，诸公诣之。及夕，独希颜、士衡留宿。高既去，未几，为主帅所诬，陷以有异志，逮捕诸党与。符下颍川，械二公，赴洛狱，榜掠万端。会赦，方得免。然自兹士衡无仕进之意矣。”

高庭玉之事和韩玉之死一样，是腐朽的金政权失去对各地方势力的控制、中央权力削弱的表现，也是汉族人士对金政权之认可超过女真族的表现。《中州集》卷五有其诗四首。《飞山怨》是其在狱中所作：

汉家自有飞将军，军中骇叹箭有神。
一朝乃与狱吏对，惜无千金书赎背。
手把属镂口衔须，号天者三我何辜。
伊吾壮志长已矣，不得提携玉龙死。
可怜休唱白浮鸠，至今秦人悲杜邮。

其余都以象征和想象见长。如《柳絮》：“黄莺枝上语，似与诉飘零。”《天津桥同李之纯待月诗一首》则可和辛弃疾《太常引》相媲美：

骖鸾追散仙，乘槎抵银潢。
 跳上玉龙背，抱得银蟾光。
 素娥愁不归，再拜捧瑶觞。
 问以天上事，玉色俨以庄。
 尔能为我歌白雪，我亦为尔捣玄霜。
 不然借我广寒殿，与我长作无何乡。
 傍有谪仙人，拍手笑我狂。
 天风忽吹散，人月两茫茫。

其过人之才和其爽直的性格是相一致的。

周驰不肯降蒙古，携二孙赴井死。

周驰，字仲才，号迂斋，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人。经学出于王广道，赋学出于李时亨。党怀英、赵秉文都是其忘年友。大定中住太学，屡以策论魁天下。家素饶财，乡人强以子弟从之学，所得束脩，皆散诸生之贫者。济南陷，不肯降，携二孙赴井死，乡人葬之宅后之寿乐堂。《中州集》卷七载其诗二首，都是能切其本质的咏物好诗。这是个能实践其所学的传统知识分子。

没有被兵的沁水县令李广所作《自灵泉寺至偃月山》还是那么悠闲。

“立马松间首重回，乱峰无数翠成堆。为寻偃月山前路，直向白云深处来。”（《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五十一）而卫州十二月童谣云：“团圞冬，劈半年。寒食节，没人烟。”不久，蒙古兵于明年正月破卫州，城郭成了丘墟（《金史·五行志》）。

杨弘道作《吊元老》诗并序。

见《小亨集》卷四。元老为其妻父康震之遗孤，贞祐元年十月望日以羸疾卒，年仅六岁。“宿草荒芜应满地，柔兰凋落忽空庭”，序及诗都真切感人。

赵秉文撰《东明令王君（毅）鸡泽令杨君（过）死节铭》（铭云：“边臣失机，竟速抵巇。来亦不麾，去亦不追。生视六陴，反弃其师。令尉之卑，而能死之。噫！”既有对边帅的愤慨，又充满无奈。见《滏水集》卷十一）。孙弼撰《孟子祠记》（见《金文最》卷二十九）。锦溪老人张汝纳撰《重立晋大夫荀叔庙碑》（见《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三。《全辽金文》未收。碑存山西省乡宁县）。《李瑞林墓志》（见《海东金石苑补遗》卷五，《全辽金文》未收）。

赵秉文《遂初园记》应作于这一时期：

滏水西来，枝分属龙门堰。入城，溉园田十余里。城之西北隅，有园临先茔往来道，与故翰林学士王公子立成趣园相邻。园之地广修三十亩有奇。竹数千竿，花木称是。其北循墙由菜园而入，老屋数楹，名其庄曰归愚。闻户而入，名其堂曰闲闲。堂之两翼，为读易思玄之所。少南，竹柏森翳，有亭曰翠真。又南，花木丛茂，有亭曰伫香。由竹径行数十步，墙外水声潺潺然流入池中，轩之名曰琴筑。稍西，临眺西山，台之名曰悠然。其东，从书数十卷，蓄琴一张，庵曰味真。闲闲老人得而乐之。老人仰看山，俯听泉，坐卧对松竹，此其所以乐也。老人非隐者也，自量于世终无补，但当谋为早退闲居之乐耳。加我数年，年登六秩。一男三女，婚娶都毕。乞身南归，为园亭主人。断置家事，勿相关白。曰：当如我死也。饮酒不至醉，不茹葷血，衣布一袭，粝饭一盂，玄易书数册，吟讽终日。有客来则接之，焚香宴坐，与之眇天地之终始，笑梦幻之去来。浮云世事，瞪目不顾。每春和体轻，驾柴车往来隆虑山中，至秋尽乃归。未知前路能得几寒暑，山中几往来，复消几两屐耳。况朝廷以半俸优我，乡里以亲旧待我，予何忧哉？因名其园曰遂初云。

元好问《闲闲公墓铭》中云：赵秉文从平定归，“入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点司天台。崇庆二年春，太白经天，公上奏：‘岁八月，当有人更王之变。’当国者以为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卫邸，如公言。俄，转翰林直学士”。本文云：“加我数年，年登六秩”，“乞身南归”，必作于贞祐南渡之前。赵秉文今年五十五岁，又值国步维艰、主政者无能、自己不得志的时候，所以本文只能作于本年或稍前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描写的是闲居之乐，并不是隐士的生活。是在“朝廷以半俸优我”的前提下，自己又“于世终无补”的情况下，才去追求这种什么也不关己的生活的。因此，文章实际上是表达着对政治的不满和看不到国家复兴希望所发的牢骚而已。当时有这种想法和感受的人不在少数。如路铎就有《遂初园》诗，说了一通还故乡，最后云：“谛观九州事，曾不出户庭。渔父有默识，铺糟愈于醒。”这哪能真正忘怀世事呢？赵秉文还作有《遂初园八咏》，模仿的是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有《宿遂初园》绝句一首。“病身三日园亭主”，他还真的去那儿住过三天。

蒙古兵围中都，金统治者之所为和北宋末汴京被围之时极为相似。

《金史》列传第四十二：“中都围急，诏于东华门置招贤所，内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闻阁细民，往往炫鬻求售。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为大言，以诸葛亮为不知兵，（完颜）寓荐于朝。诏署行军都统，募市井无赖为兵，教阅进退跳掷，大概似童戏。其阵法大书‘古今相对’四字于旗上，作黄布袍、缁巾、鐵牌各三十六事，牛头响环六十四枚，欲以怖敌而走之，大率皆诞妄。因与其众出城，杀百姓之樵采者以为功。贾耐儿者，本歧路小说人，俚语诙嘲以取衣食，制运粮车千两。是时材木甚艰，所费浩大，观者皆窃笑之。草泽李栋在卫绍王时尝事司天监李天惠，依附天文，假托占卜，趋走贵臣，俱为司天官。栋尝密奏白气贯紫微，主京师兵乱，幸不贯彻，得不成祸。既而高琪杀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

北宋汴京被金人包围时郭京之流说能掷豆为兵，不也是被翕然共仰重的吗（《靖康纪闻》）？《金史》列传第四十五又载：“时中都受兵，方遣使请和，握兵者畏缩不敢战，曰：‘恐坏和事。’张行信上言：‘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顷北使既来，然犹破东京，略河东。今我使方行，将帅辄按兵不动，于和议卒无益也。事势益急，刍粮益艰，和之成否盖未可知，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宜及士马尚壮，择猛将锐兵，防卫转输，往来拒战，使之少沮，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和议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这和北宋之将帅又何其相似乃尔！在蒙古强大的攻势面前，金王朝之难以抵抗是很明显的。金宣宗和宋钦宗一样，都是刚当上皇帝就面对如此危急局面，不过金宣宗比宋钦宗强一点的是，在出都避敌的决断上没有犹豫，以此延长了自己的统治时间。

蒙古兵所至，屋庐焚毁，城郭丘墟，当时诸路兵都往山后防遏，于是签乡民为兵，上城守御，蒙古兵尽驱其家属来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应，于是人无固志，所至城邑皆下。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做出合时宜的选择。如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谋曰：“方今国家丧乱，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便率里中数千人诣涿州军门降。蒙古帅木华黎欲用秉直，秉直辞，于是以其子史天倪为万户，领降人家属屯霸州（《元史》卷一百四十七）。



1214(甲戌)贞祐二年(南宋嘉定七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

正月,蒙军占领彰德府、益都府。金宣宗命有司复议本朝德运。

早在明昌六年,金章宗就令七品以上官员讨论金朝之德运。经承安四年、五年集汉人进士知典故官员集议,至泰和元年都统一不了观点。主要分歧在于金朝究竟是应继承唐统还是应继承辽统、宋统甚至是曾封在中原的刘豫的齐统。最后于泰和二年十月,章宗定为金继承宋,为土德。现在,金宣宗于蒙古紧逼的情况下又旧事重提,正月二十二日下旨,命有司复议大金德运问题,就是对这个已面临衰亡的政权产生了怀疑,要为其正统寻找新的根据,为自己和臣下增强自信心。事实也是如此,经过讨论,最后上议状之中同意继宋为土德者四人,同意应为金德者十四人。具见《大金德运图说》。因为金章宗时是以汉文化为标准来为自己的政权确立正统地位的,才不惜否定金太祖的金德而情愿继承被金所灭的北宋为土德。现在,金宣宗和臣下又想找出新的理论,以金太祖的金德来恢复大金的强大和无敌了。其实,北宋自认是火德,火能克金,最终反为金朝所灭,就证明所谓的五德终始理论之虚妄。这种讨论不会给金王朝带来任何好处。讨论到二月二十日也没见有什么官方结论,也可能是在蒙古军的进攻下顾不上了。

三月,蒙古与金达成和议。七月,金宣宗南迁汴京。

中都被蒙古军所围,将帅皆不肯战。粮运道绝,金宣宗令奥屯忠孝搜括民间积粟,存两月食用,悉令输官,酬以银钞或僧道戒牒。在此以前,知大兴府事胥鼎已经为筹集军粮许人纳粟买官,忠孝不许除去胥鼎已籍之数,令百姓两输以为己功,因张行信之谏才停止。蒙古诸将都请乘胜攻下中都,成吉思汗不答应,派人告诉金宣宗:“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弥我诸将之怒耶?”(《元史》卷一)成吉思汗之不急于灭金,是因为蒙古游牧民族政权正处于和金初一样的初级阶段,他们是以掠子女财物为目的,还没有树立占领土地建立政权的观念,所以留下金政权来使中原休养生息,以便下次入侵收获,是最符合其利益的。最后,金宣宗以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并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献给成吉思汗。蒙古兵退,中都解严,遣主和的完颜承晖送出居庸关。

蒙古军退,金宣宗面对河北残败不堪、财用匮乏、兵弱粮缺的局面,决定将都城南迁至富庶而人口众多的汴京去。和北宋钦宗时不一样的是,此举当然

有许多人反对，但也得到很多重要人士的支持。反对者的理由是：迁至南京则大河以北不可保，最终导致国家走向灭亡，应该以宗庙社稷为重死守；否则，以“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也是可考虑的方策（《金史》列传第三十七、《大金国志·宣宗皇帝上》）。拥护者的理由是：古今殊时，势事亦异，舍河北以满足蒙古之欲，则河南、山东可为国家长久之计，“今中原之规模既失，惟有经画两河犹不失为曹魏、元魏之时也”（《金史》列传第三十七、《大金国志·宣宗皇帝上》）。最后，金宣宗决意南迁，并且不论太学生赵昉等上章再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为由慰谕而遣之。七月，宣宗至南京，八月，连留守在中都的太子也被召到了南京。史称贞祐南渡。从此，金代进入了后一个时期。金政权的中心迁至南京的根本原因在于：已经彻底转入农耕文明的金政权绝对不是处于游牧民族上升时期的蒙古的对手；已经汉化了的金朝统治者对其兴起之地辽东不再感兴趣；国库空虚、兵力虚弱的金政权不可能在太长的战线分布兵力，只能缩短战线集中防御；富庶而人口众多的河南、山东已经成了河北残破之后的经济文化中心。如果不及时迁都，这一地区也会失去控制，当时在山东出现的如火如荼的红袄军起义就是证明。也正因为如此，金朝迁汴后又维持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而不是像北宋一样迅速灭亡。

在这个时候，赵秉文上疏言三事：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

元好问《闲闲公墓铭》言其大略。现《滏水集》中存有《迁都论》、《侯守论》。对于迁都，他认为“不迁愈危且弱矣”。迁河南和陕西不过恃潼关和大河之险，但有夏人和宋人的威胁，所以不如迁至山东，海道可通辽东，兵运直接上京。开黄河故道由沧景入海，则山东、河南为一，大河险阻可以依靠。对于建侯和置守，他认为应该效法三代实行封建，诸侯世有其地则各爱其民，修其城郭备其器械，人自为战。人自为战则我众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不管他所提的正确与否，总是在针对当时的问题积极出谋划策。赵秉文在这一时期写了一系列论文。《滏水集》卷十四载有十篇，除了以上两篇外，还有《总论》、《西汉论》、《东汉论》、《魏晋正名论》、《蜀汉正名论》、《唐论》、《知人论》、《直论》。从文体上看，还有模仿《过秦论》、《公羊春秋》等古文的痕迹。从内容上讲，则都是针对金代当时的实际，以儒学理论为基础提出解决的方法。比如他在《总论》中，提出“国家之兴，未有不先实而趋华。华之极，则为奢、为僭、为奸、为伪，则日趋于乱矣。天下不可无正人，亦不能无邪人，在人君所处之。正胜邪，则治之原也；邪胜正，则乱之端也。邪胜极，则为请托公行，为谗妒并兴，则日趋于乱矣。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兵备，亦不可一日而乏财用。用之有道，治之原也；用

之非道，乱之端也。二者之弊为黩武，为聚敛，则日趋于乱矣”。《知人论》中又指出：“至于国家覆败而不可支持，未尝不本乎小人之为患也。”“小人不知大体而寡小过，苟得苟合，易进而难退，君子知大体而不免小过，不苟得，不苟合，难进而易退。”他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能是坚持仁义的原则，使大纲小纪一出于正，以仁义刑政治天下；臣子如西汉之大臣宽博有谋，东汉之大臣忠义有守；社会重名节之士；人主赦君子之小过，而不休于小人之寡过，以责其远者大者。可以说他对社会的弊端看得很透彻，而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则没有超出传统的思路，空洞而有些迂腐，但是其忧心如焚之情则充溢于字里行间。

三月，蒙古兵陷忻州，元好古死于屠城之祸。

《中州集》卷七王万钟传：“贞祐二年，（忻）州破，死者十余万人。时三月三日也。”元好古，字敏之，为元好问之兄。性颖悟，读书能强记。父歿后，母亲望其立门户甚切，但两次举进士不中，甚感失望。娶妇，感情不和，日致恶语，遂以狷介得疾。贞祐元年中秋约王元卿、田德秀、田献卿等人宴集，其夜阴晦，他作诗云：“佳辰无物慰相思，先赏空吟昨夜诗。莫倦更深仍坐待，密云还有暂开时。”大家说：“诗境不开阔，君才尽耶？”他回答：“我得年仅三十，境界得开阔否？”果然第二年就遭屠城而死，年仅二十九^①。他的诗的确才不足，和其年龄并无关系。他对其弟元好问很推崇，《读裕之弟诗稿有莺声柳巷深之句漫题三首其后》云：“慚愧阿兄无好语，五言城下把降旌。”只是“传家诗学在诸郎，剖腹留书死敢忘”下注云：“先人临终有‘剖腹留诗’之语”，就有点太过于执著了，他的诗境不开阔和思想太狭隘有关。《中州集》卷十收其诗五首。

对于这次忻州之祸，赵元有《邻妇哭》、《修城去》诗。

赵元，字宜之，号愚轩居士，定襄（今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人。举进士不中，凭资历调巩西簿。未几失明，泰和以后有诗名。元好问称其“自少日博通书传，作诗有规矩”（《中州集》卷五小传），实际上他的这两首诗才是最有价值的。其一是《邻妇哭》：

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

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掳。

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

^① 元好问《敏之兄墓铭》作“二十九”，《续夷坚志》卷一《敏之兄诗谶》作“三十二”。

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莱。
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余丁。
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

其二是《修城去》，下注云：“甲戌岁，忻城陷，官复完治，途中闻哀叹声，感而有作。”

修城去，劳复劳，途中哀叹声嗷嗷。
几年备外敌，筑城恐不高。
城高虑未固，城外重三壕。
一锹复一杵，沥尽民脂膏。
脂膏尽，犹不辞，本期有难牢护之。
一朝敌至任椎击，外无强援中不支。
倾城十万户，屠灭无移时。
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
百死之余能几人，鞭背驱行补城缺。
修城去，相对泣，一身赴役家无食。
城根运土到城头，补城残缺终何益。
君不见，得一李勣贤长城，
莫道世间无李勣。

诗中反映了蒙古入侵给人民所造成的苦难，特别是谴责了金代统治者的无能。这种有强烈的社会性的作品在金代已经久违了。金代文士学白居易的很多，但写这种讽谏性的、反映人民痛苦的太少了。

同时遇难的还有田紫芝。

田紫芝，字德秀，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人。少孤，养于外祖家定襄赵氏，多居于忻州。六七岁知属文，一览万言，十三岁赋《丽华引》，语意惊绝，人谓李长吉复生。和元好问兄弟相游从。本年避兵于台山，仓猝间为游骑所追，遇害，时年二十三。他和元好古有点像，科举不第。《冥鸿亭下第后作》：“眼底功名一物无，飞扬跋扈竟何如。青云歧路多辛苦，赖得皇家结网疏。”充满不平和自负。他的早死也被人看作与诗有关。元好问在《续夷坚志》卷四“田德秀夙悟”中记元好古谓田德秀大雨后见示之诗中有鬼语，非寿者相；在“田德秀诗”中又云其“纵袴间作诗多憔悴之语”。《乱后登凌云台》云：“愁思纷纷不易裁，凌云台上独徘徊。乱鸦背著斜阳去，寒雁带将秋色来。破屋无烟空碎瓦，新坟经

雨已苍苔。天翻地覆亲曾见，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台”。但令人费解的是元好问接着讲：“无忧而戚，古人所忌。王荆公诗：‘少壮不宜轻感慨，文章尤忌数悲哀。’真名言也。”田紫芝的诗怎么能说是“无忧而戚”？文章不写悲哀又怎么担负起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又怎么能感人？元氏的这种观念必定会影响他的创作达到更高的境界。

元好问本人则避兵阳曲北山之羊谷，作《石岭关书所见》、《避兵阳曲北山之羊谷题石龛》。

石岭关，为忻州至阳曲所经之地。诗云：“轧轧旗车转石槽，故关犹复戍弓刀。连营突骑红尘暗，微服行人细路高。已化虫沙休自叹，厌逢豺虎欲安逃。青云玉立三千丈，元只东山意气豪。”（《元好问全集》卷十）第二首诗云：“冥鸿正恐挂疑网，脱兔不忘投茂林。世故驱人真有力，天公困我岂无心。”（《元好问全集》卷十四）诗的确没有悲哀之音。

赵思文在中都城中作《捕蝗感草虫有作二首》。

蒙古和金的和议本就靠不住。金宣宗南迁后，成吉思汗闻之，怒曰：“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特以解和为款我之计耳。”复图南侵。六月，令三摸合、石抹明安与斫答等围中都。赵思文《捕蝗感草虫有作二首》：

虽是形模不苦争，汝能伤稼我能鸣。

谁知竟有长平祸，玉石填来共一坑。

草虫悲咽不能言，乱逐螟蝗瘗古原。

水底痴龙正贪睡，瓮中蝎虎更衔冤。

诗见《中州集》卷八，元好问在诗下注云：“二诗疑围城中作，观者可以意推之。”两诗形象地表达了战争中玉石俱焚的无奈。

在反抗蒙古军的侵略战争中，金代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忠节之士。

山东郡县望风而遁，泰安州刺史和速嘉安礼独守城，云：“为人臣而避难，不负国家之恩乎？”城破，使之跪，胫不曲，蒙古兵以戈撞其胸而杀之。高守约，大定二十八年进士，为观州刺史。城破被执，不屈而死。李演，泰和六年进士第一，为济州刺史，被执，许以官禄，答道：“我书生也，本朝何负于我，而利人之官禄哉？”大将怒，击折其胫拖出杀之。王毅，经义进士，官东明令，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郭外，王八将降，王毅用脚踢倒他，厉声道：“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

乎！”被以刀斫胫而死。王晦，明昌二年进士，守顺州，被执不肯降就死。其爱将牛斗说：“蒙公见知，安忍独生。”也一同被杀。乌古论德升守太原，城破自缢而死，其姑及妻皆自杀。还有齐鹰扬、术甲法心、咬查刺等人也同样不屈而死。

这些忠节之士中有一些文学之士，比如路铎、李著、史士举。

路铎，字宣叔，为路伯达之子，时任孟州防御使，蒙古军陷城，投沁水死。《中州集》卷四收其诗二十六首。“入坐好山如有素，忘情鸥鸟澹相亲”（《赫仲华求赋邺台张氏野堂》），“有意候君门外柳，无机还我酒中天”（《题邹公所藏渊明〈归去来图〉》），“云回暑天影，雨进夜窗声”（《雨中》）都很精致温润。《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选金诗》卷九有其《清风阁》诗一首，《全辽金诗》未录。他还是个钟情之人。《续夷坚志》卷四“护兰童子”云“孟州路宣叔，未二十而娶。未几妻亡，追悼不已，郁不自聊。夜梦妻如平生，说身后为护兰童子，任职翡翠庵。作诗记之云：‘翡翠庵前花草香，护兰童子淡云妆。夙缘还却三生债，不道未归人断肠。’”

李著，字彦明，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承安二年经义进士第一。在翰林七年，出副定州，召为户部员外郎。因大中党事，谪临洮府判官。后因赦酌量移任西京路按察司判官，迁彰德府治中。城再陷，避于塔上。兵人招降，大骂不从，掘塔倒而死。乾隆二十七年《正定府志》卷二十一云：“贞祐中历彰德治中。”可知即是此时。《中州集》卷九云其诗文得前人体，工于字画，颇善玄言。从其存留的一首《观音院书阁》诗来看，也是如此：“鸟声落枕有高下，山色阅人无古今。客里三年侵老境，床头一易浣尘襟。”

《中州集》卷九所载荥泽（今河南省郑州市）人史士举也一样，“贞祐之乱，避于太行，保聚失守，老幼皆出降。仲升义不受辱，投绝涧而死”。所存两诗，都很清丽。如《晋祠》：“小桥流水竹萧森，竹里人家一径深。只欠东风小篱落，梅华疏淡月笼阴。”如果只看路铎、李著等人工稳新奇的诗句，很难和他们刚烈忠节的人生结局结合起来。如果他们还能继续生活下去的话，战争的经历必定要使其诗风发生改变。

在蒙古围中都时，李英、侯摯、田琢自动请求招乡里义兵守要冲，提兵扼居庸关，屡战有功。赵秉文作《从军行送田琢器之》诗。

申万全、刘徽、张本、李天翼、李过庭、王宾中进士。

申万全，字百胜，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人。少有声于太学中，《中州集》·

卷七云其中本年乙科，调福昌簿，不赴，隐居卢氏山中，以读书为业，录有其诗三首。

刘徽，字伯祥，益都（今山东益都）人。七岁能文。章宗召入宫，赋《凤凰来仪》二首。赐经童出身，籍太学。《中州集》卷八收其《春柳应制得城字》诗一首，中云“更看三月春风里，散作飞花满凤城”，是很好的一首应制诗。

张本，字敏之，观津（今河北省武邑县东审坡镇）人。四十岁后学诗，《中州集》卷七收其诗十首。

李天翼，字辅之，固安（今河北省固安县）人。历荥阳、长社、开封三县令，右警巡使。金亡后死于非命。《中州集》卷八有其《还家》三首。“殊音异服不相亲，独倚荒城泪满巾。只有青山淡相对，似怜我是此乡人”，要比“乡音未改鬓毛衰”心酸多了。

李过庭（？—1242），字庭训，武亭（今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人。历宜阳、永宁、荥阳县令，终于昌武军节度副使，《中州集》卷八收其《读公孙弘传》诗一首。

王宾（？—1233），字德卿，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擢第后为虹令。《金史》卷一百一十七有传。共存诗四首，佳句七则，见《中州集》卷七、《归潜志》卷九。

冯延登作《玉楼春·宴河中瑞云亭》。

《金史》列传第六十二云：“贞祐二年，补尚书省令史，寻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故知作于本年。但他写的却是“行杯莫厌转筹频，佳节等闲飞鸟过”的行乐内容，见《中州乐府》。

张翰卒。

张翰（1160—1214），字林卿，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人，大定二十八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金史》列传第四十三有传。《中州集》卷八录其诗五首，都很工稳老成。

国偁撰《圣水岩玉虚观记》（记王处一之神通，有类于志怪小说，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二十八）。柳汲撰《河中府万泉县稷王庙祈雨感应记》（见民国六年本《万泉县志》卷六）。完颜素兰有革弊政恤妄费疏（见《金史》列传第四十七）。郝天挺有《贻范云直书》，请求范渡南迁之流民（见郝经《陵川集》卷三十六《先大父墓铭》）。孔朝散题郿县老君庵《饮中用昌裔韵》（诗云：“左峰附右

后攀前，如弟如兄翠接肩。偿我多年忆山愿，此行信是不徒然。”还算自然而然而不依傍前人，见陆耀遹《金石续编》卷二十）。释志益卒，有《辞世偈》（见光绪八年《平遥县志》卷十二）。

冬十月，蒙古木华黎征辽东，高州卢琮、金朴等降。锦州张鲸杀其节度使，自立为临海王，降蒙古。

南宋议停与金之岁币。徐玑(1162—1214)卒。

1215(乙亥)贞祐三年(南宋嘉定八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

春，元好问作《梁园春五首》：

军从南去三回胜，雪自冬来二尺强。
今岁长春多乐事，内家应举万年觞。

暖入金沟细浪添，津桥杨柳绿纤纤。
卖花声动天街远，几处春风揭秀帘。

上苑春浓昼景闲，绿云红雪拥三山。
宫墙不隔东风断，偷送天香到世间。

楼观沉沉细雨中，出墙花木乱青红。
朱门不解藏春色，燕宿莺喧处处通。

双凤箫声隔彩霞，宫莺催赏玉溪花。
谁怜丽泽门边柳，瘦倚东风望翠华。

见《元好问全集》卷六。汴梁，即金南京汴梁。诗题后注云：“车驾迁汴京后作。”第一首中的长春，即长春节，是金宣宗之生日，三月十三日。最后一首中的丽泽，是金中都的西门。玉溪，即玉溪馆，在龙德宫。作者极力描写汴京朝廷和贵族的奢华以反衬其抛弃河北、苟安南京的愤慨，也表现出对中都安危的忧虑。元好问此时很可能是赴南京参加省试。